

一、苏格拉底

古希腊“最饶有趣味的人物”

公元前 469 年，苏格拉底（Socrates）出生于雅典附近的阿洛佩凯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索弗罗尼斯科斯是石匠和雕刻匠，母亲法伊纳列特是接生婆。苏格拉底的父亲与雅典著名的民主派政治家阿里斯特伊德斯是好友。苏格拉底出生在希波战争（公元前 483 ~ 前 449 年）的后期，正值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制度蒸蒸日上之际。公元前 457 年，由于伯里克利（Pericles）的改革，以前只有一二等公民拥有的当选为执政者的权利也扩大到三四等公民。作为手工业者，苏格拉底的父亲是这一改革的受益者，雅典的民主制度给苏格拉底的家庭带来了政治上的好处。苏格拉底自幼就受到雅典民主制度的熏陶。他认为，是国家的法律把他带到了世界上，抚养了他，教育了他，让他和同胞们分享所有的好东西。他热爱雅典，热爱雅典的制度，为雅典的光荣感到自豪，对雅典的未来充满信心。他热爱这一城邦和它的法律甚于其他雅典人。他自诩“不论在战场上，在法

庭上，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你都必须服从你的母邦和国家的命令……不能伤害你的国家”。

苏格拉底曾学过雕刻手艺，他勤奋学习，熟读了荷马和其他诗人的作品，吸收了家乡街头传闻的各种新理论。他与已届老年的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虽只见过一次面，却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苏格拉底是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的再传弟子。阿那克萨戈拉一生中在雅典生活了约 30 年（公元前 462 ~ 前 432 年），是伯里克利的密友。据罗素说，“作为第一个把哲学带给雅典的人，并且作为塑造了苏格拉底的影响者之一，他还是重要的”。苏格拉底活动的时期，也正是来自希腊各地的智者活跃于雅典的时期，他曾听过智者普罗底卡斯（*Prodicus*）的讲演，并盛赞其人；与智者安提丰（*Antiphon*）辩论过；与智者希庇亚（*Hippias*）讨论过关于正义的问题。但是，他对智者的无知佯装有知、争名求利、无原则、无是非和巧言佞色深感厌恶。这促使苏格拉底从反面去思考人生的真谛、真理的实质，使他得以高出智者之上，并开辟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公元前 449 年，希波战争以雅典的完全胜利告终。这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对于波斯的专制制度的胜利。战争的胜利把雅典推到了希腊各邦的无可争议的盟主地位，使雅典的奴隶制民主进入黄金时代。可是当雅典人沉浸在胜利、权威、荣耀、财富、文明的欢乐中而自满自足的时候，深藏在欢乐背后的危机正暗暗滋长。法制观念的淡化、道德的沦丧、追逐钱财和权力的引诱，以及智者们的无原则、无是非的诡辩，一大堆隐患啃噬着雅典的民主制度。苏格拉底以哲学家的深思和敏锐的目光看到了雅典繁荣景象背后潜伏着的深刻危机。他决心抛弃一切

个人的天伦之乐和物质享受，担负起教育公众的重任。大约从 30 岁开始，他为此艰苦奋斗了 40 年。

苏格拉底曾三次奉命从军参战，当过重装步兵。在第一次战役中，他的门徒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身负重伤，他奋不顾身，击退敌人，救出了阿尔基比阿德斯。在第二次战役中，他的另一个门生色诺芬身负重伤，他冒死救援，使之得以生还。在战斗中，苏格拉底英勇顽强，任劳任怨。有一次遇到严寒，这时只有苏格拉底赤着脚站在冰上，穿着平时的衣服，但他比别的穿了鞋的兵士走得更好。苏格拉底自己承认，在战争中“我也像别人一样坚守岗位，正视死亡”。

公元前 406 年，雅典在与斯巴达的一次海战中大获全胜。但是巨大的风浪使雅典的 25 艘战舰沉没，将军们无法按照惯例将阵亡战士的尸体带回雅典，人民因此要求将十名海军将领同时审判，并全部处死。苏格拉底这时正被选人五百人议会，并担任值班的执政官。他认为，同时审判十人而不是个别审判，违反了雅典的法律，遂投了反对票。

公元前 404 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31 ~ 前 404 年）中最终被斯巴达击败，在斯巴达的将军来山得（Lysander，亦译吕山德罗斯）的操纵下，雅典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建立了由斯巴达支持的“三十僭主”的统治。

除了三次奉命参战、一次被选人五百人议会、一次与三十僭主发生冲突外，苏格拉底再没有卷入政治活动，也从未离开雅典。苏格拉底说：“我一生从没过过宁静的生活，我从不关心大多数人所关心的事情：诸如赚钱，建立舒适的家庭，谋求高官厚禄等；也没有参与如政治、秘密结社、结党等在我们城邦从未间断过的政治活动。因为我想，由于我过于恪守原则，

如果参与这些生活，就难保性命。……我试图说服你们每个人不要更多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利益和其他公众利益。”

当雅典民主政体的存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像公元前 411 年、404 年、401 年两次被独裁专政所推翻和一次有被推翻之虞的时候，雅典的民主派不免慌了手脚。尤其是在独裁专政政权的领导人中，不乏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如克里底亚斯之流。因此即使在独裁专政被推翻，民主政体得以恢复之后，看到苏格拉底依然纠集一批年轻狂妄的富家子弟于他门下宣扬反民主的学说，恼羞成怒的雅典民主派就再也坐不住了，由三个公民法庭出面，对他提出了控告。公元前 399 年，雅典的民主派政治活动家、硝皮匠安尼图斯（Anytos）、“年轻而不著名”的悲剧诗人墨勒图斯（Meletos）和默默无闻的雄辩家李康（Lycon）等人联名对苏格拉底提出控告。

根据柏拉图的《申辩》篇中所引的苏格拉底自辩词，苏格拉底自称控告他的起诉书“大致如下：它说苏格拉底是个做坏事的人，因为他腐蚀了青年，不相信国家（城市）所信奉的神祇，而相信其他新的精神存在”。色诺芬的《回忆录》里说得更简略，只说苏格拉底被控“教导他的年轻朋友蔑视现行制度，使得他们狂暴起来”。这大概可以作为柏拉图版本所说“腐蚀了青年”的内容：不相信国家（城市）所信奉的神祇和蔑视现行制度。

古代希腊人除了信奉奥林匹克山上的神祇以外，各个城邦还信奉自己专有的神祇。在雅典是“说服”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这是雅典民主的象征。苏格拉底不信奉这两个神祇是出于他对雅典民众和议会制度的蔑视。

苏格拉底不仅蔑视雅典的民主制度，而且也蔑视雅典的司法制度。雅典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庭是由五百名来自社会各阶层民众的陪审员组成的。这类刑事审判一般投两次票，第一次是要表决是否有罪，如果判定有罪，陪审团还要在量刑上再投一次票。如果正反票数相等，表决按有利于被告的方式解决，应该说这种判决办法是相当宽容的。苏格拉底的最亲近的弟子赫尔摩奇尼斯求他准备一份雄辩有力的辩护词，因为陪审员很容易为口才所折服。但是苏格拉底却拒绝这么做，反而口出狂言，自称不同常人，有自己个人的神灵指导，还说神谕说他是世界上最贤明的人，而所有别人，不论多么出名，不论是政治家还是诗人，都是一些笨蛋。他的狂妄自大态度两次引起全场人群哗然，这可不是争取无罪开释的办法，以至第一次投票以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表决他有罪。

据苏格拉底告诉赫尔摩奇尼斯，他所以不愿为自己辩护，是因为指导他的神灵叫他不要这么做，认为还是现在死去为好，免得老年为疾病所困：“如果我将来眼看着自己衰老下去，而且总是感到病痛，我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因此，死是他的选择，他只有从生气的陪审团那里弄到手，这就是他为什么在为自己辩护时发言狂妄自大，有意激怒陪审团的缘故。但是陪审团还是相当宽容的，第一次表决票数相差不大，而且按雅典惯例，第二次量刑表决是在起诉方面和被告方面提出的两个建议中作一选择（不是折中）。鉴于第一次表决票数相差不大，起诉方面又提出要求判他饮鸩自尽，这很可能会引起陪审团对被告的同情，因此只要苏格拉底提出自愿流放（这是当时常见的一种仅次于死刑的最重刑罚）或者付一笔为数足以满足犹豫不决、内心不安的陪审团的罚金，死刑是完全可以免的。

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苏格拉底又以他的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法庭的蔑视而更进一步地激怒了陪审团。他先是拒绝提出反建议，认为：“提出任何刑罚一举本身就是承认有罪。”继而他又狂妄地建议的刑罚是宣布他是公民英雄，在今后余生中由市政厅免费供他一日三餐！而按惯例，只有值班的市政会议成员、外国使节、公民领袖、奥林匹克优胜者和保卫城市和民主的功臣才享有可以在市政厅免费用餐的殊荣。这是个荒唐的玩笑，苏格拉底也觉不妙，便马上收回，但为时已晚，反感已经造成。但他仍不思补救，进而又提出为数只有一块钱的象征性罚款！他的弟子们都大吃一惊，后虽在他们央求之下他才改为三十块钱（并由众弟子们作保，可见为数也不算少），但他原先一再反复提出的荒谬建议一定使得陪审团觉得他是有意在开他们的玩笑，以表示对这次审判的蔑视，以至以三百六十票比一百四十票判他死刑。换句话说，原来判他无罪的人中竟有八十个转而投了他的死刑票。看来好像是苏格拉底自己有意把鸩酒送到唇边。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的几个学生到监狱去看他。柏拉图在《斐多篇》这部与世界上伟大的史诗并列的著作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学生们围坐在敬爱的老师周围。苏格拉底让一个学生坐在他的身边，抚摸着他的头发，讲述他关于生与死和灵魂不朽的思想。死亡或许是永远地睡眠——永远地、愉快地忘掉一切，没有迫害，没有邪恶、没有失望、没有痛苦、没有不幸——要么，它就是我们从尘世走向天堂的入口，是走进神的宫殿的前厅。“我的朋友们，在那里没有谁会因为他提出意见而被处死……所以对我的离去应该高兴，不必悲伤……当你们把我安置在坟墓里的时候，你们仅仅埋葬了我的身体，而没有

埋葬我的灵魂。”

日落的时刻临近了。看守拿着毒酒走了进来。“请您不要忘记恨我，唉，苏格拉底，您知道，恶毒地要您死的是别人，而不是我。”看守一边说，一边把酒杯递给苏格拉底。他在转身出去时，突然大哭起来。

“我们大家也都不能自制，不禁泪如雨下……只有苏格拉底自己依然平静如初。‘所有这些无意义的举动是为什么呢？’他说，‘我把女人们劝走，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安静些吧。让我在安静中死去。’”

“听到这样说，我们感到很惭愧，强忍着眼泪。……苏格拉底喝下了毒酒，遵照看守的叮嘱躺在吊床上。”药毒一点一点从脚底蔓延到他的全身，直至侵向心脏。“接着一阵痉挛，苏格拉底便瞌上了眼睛。……这就是我们老师的最后一幕，我可以肯定他说，他是我曾经知道的人当中最有智慧、最高贵和最优秀的人。”

苏格拉底终年 70 岁。死后留下三个儿子，一个快要成人，两个还是幼童。

“精英教育”始作俑者

苏格拉底是历史上最早的专家治国论者。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有专门知识的治国人才，这种人才观的特质与当时雅典民主政体的基础格格不入，其分歧表现在三个根本问题上：人们选择何种社会政体、什么是美德和知识以及个人与群体在政治中的关系。

第一个分歧在于：民主政体的本质前提是公民的平等，而

不论公民身份限于少数或者多数。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们则否认人类群体可以是一个权利平等的公民自治体，而认为是一个需要牧羊人式的国王统治的一伙羊群，国家应该由那个“知道的人”统治，“发命令是统治者的事，服从命令是被统治者的事”。它的前提是一种根本的不平等：没有人是公民，大家都是臣民。

有学者提出苏格拉底的意见反映了当时政治要求专业化的倾向，即治理城邦需要专才，而不能把权力分散在没有政治知识的普通公民手中。但即使如此，苏格拉底在下述两个关键问题上也没有提出有效办法，第一，如何找到这样一位“知道的人”；第二，当这个“知道的人”判断有误或滥用权力时，人民怎么去制止他、更换他。其实，这也是人们虽明知民主制存在不足，最终仍选择它的理由。苏格拉底既不能也无心解决这两个问题，他的“政见”极可能转化为最老式的王政和暴政，甚至进而成为最彻底的极权可能性，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对此进行了详尽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

公元前 404 年，独裁专政领导人克里底亚斯的主要副手查尔米德斯（他是柏拉图的叔舅）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曾表示他在议会上讲话有些胆怯，苏格拉底教训他道：“最有智慧的人也不会使你害羞，然而你却不好意思在一批笨蛋和傻瓜面前讲话！”然后他一一列举这些笨蛋和傻瓜是“漂洗羊毛的、做鞋的、盖房的、打铁的、种田的、做买卖的、或者在市场上倒卖的，他们除了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外什么也不想……而你却对这些……人讲话感到胆怯？”而最足以表达他的“知者统治、别人服从”的政治哲学的，莫过于下面一段话。他说：雅典议会要处理建筑工程时会请建筑者提意见，要扩充海军会请

造船者，议会在这些专门问题上依靠有训练的专家，如有非专家想发表意见，开会的市民便会“一笑置之，不去理他”；惟独在讨论政府基本问题时，“站起来向他们提供意见的，却可能是个铁匠、鞋匠、商人、船长、富人、穷人、出身好的、不好的”，却没有人想到责备他们对正在讨论中的问题没有受过训练。

苏格拉底劝诫他的同胞们要有美德，而在关于什么是美德的问题上，又构成了他们之间的第二个分歧。

雅典人认为，公民作为“政治的动物”，他需要具有过群体生活必需的美德，即正义感、羞耻心和对他人权利的足够考虑以使文明的群体社会得以维持生存。

在苏格拉底的定义里，美德等同于知识，并且是不可教的知识——可教的知识只是技能，是外在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绝对定义才能得到。由于人们难以对某一事物下绝对定义，所以，真正的知识是得不到的，连他自己也得不到。推论是，只有那个“知道的人”可以拥有知识和美德，普通人不但不能拥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拥有，也可以说是不配拥有。这种观点依然指向他的基本信念：人是一群需要放牧的羊。

更激怒众人的是，苏格拉底认为知道这“底细”的只有少数的几个“通天”的人，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本质的问题是，苏格拉底关于知识和美德的定义打击了雅典民主的基础本身，这个基础是在此两个世纪以前伟大的立法者和社会改革家梭伦创始的，他给予所有的男性公民，包括最穷的公民，在议会的陪审团法庭上投票的权利。希腊人的观点给予了普通人以尊严，而苏格拉底的观点则贬损了它，这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分歧。

第三个分歧在于对“幸福生活”，即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的理解。

雅典人认为，个人只有在社会群体中同别人发生关系时才能找到幸福的生活，参与“政治”——即管理城市是一种权利、一种责任、一种教育。梭伦曾说，一个人不应该对公共利益不闻不问，只顾安排自己的事，以不参加国家的动乱和危难为荣。

而苏格拉底的言传身教则是退出城市政治生活，他为此辩解的理由是，“内心的声音”警告他不要参与政治：“你们认为，如果我参与公共生活：做一个好人应做的事，向公正的事情尽我的能力，并且把这认为是最有重要意义的事，我能活到这么高龄吗？”并且，他认为，不参与政治是为了使灵魂不蒙上污点。

但一个人，特别是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拥有大量追随者和相当影响力的著名人物，平时可以不参与任何党派政治，但在面临“深刻的道德性质的紧迫问题”时，是否还可以“站在一边”？

比如这样的时刻，公元前 416 年，一个名叫米洛斯的城市在经受雅典一冬天的围困后弃械投降，雅典面临两种选择，宽恕还是屠城（最后的选择是后者）。其时苏格拉底五十三岁，被来自希腊各地的弟子所包围，他的一位心爱的弟子在议会中力主屠杀，如果苏格拉底在议会中说了话，有可能救千万人于一死，这在不远前的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再比如这样的时刻，公元前 404 年，三十僭主（其中又至少有两个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推翻民主制，实行恐怖统治，杀人如麻，甚至苏格拉底也被召去“禁止其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谈话”。这时期“民

主派”和“稳健派”或被驱逐或为抵抗纷纷出城，“留在城里”成为不光彩的招牌。此时，苏格拉底的动向更是倍受瞩目。事实是，在所有这些重大时刻，苏格拉底都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

这个以“牛虻”自诩、全雅典最喜欢说话的人，总是在最需要说话的时候保持沉默，而且柏拉图也在他的书中保持沉默。是怯懦吗？苏格拉底以勇气闻名。是赞许吗？私下里也有腹诽。阿里斯托芬曾写过一出喜剧《云》讽刺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确乎像生活在云中，他让每一个人关注自己的灵魂，却对他们的切肤之痛、生死祸福无动于衷

“认识你自己”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或3世纪，希腊正处于理智动乱时期，这时，为了辨别力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些能够迅速传递各门知识的人。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出现了从事教育工作的、名为“智者”的阶层。柏拉图在《论美德》中问道：“智者不是批发或零售精神食粮的人吗？”雄辩大师们，如游塞德马斯（Euthydemus，亦译欧若得摩）和他的兄弟底昂索斗拉斯（Dionysodorus），以及出身哲学世家的普罗底卡斯和“人类最聪明的”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都声称他们自己是“改善道德的惟一专家”。

智者的教学没有任何体系；并且它只给那些少数能够付得起学费的人讲授，因陋就简而范围很小。例如，苏格拉底说：“我第一个承认，就我自己而言，我从没有当过教师；虽然我从童年时就憧憬着有一位教师。我穷得付不起改善道德的惟一

专家——智者们的学费。”智者派讲学收费，开创了人们可以通过获取知识从而获得同辈市民所得不到的特权。结果，智者派所讲授的不再是最好的东西，而是学生所想听到的东西，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教育。例如，只讲授词句的用法，而不讲其涵义。

对智者派的普遍态度，从人们迸发的愤慨中可以得知。如苏格拉底建议安尼特斯（Anytus）让米诺到智者派那里去受教育，安尼特斯说：“把钱给智者派的年轻人都是精神不正常，这些年轻人的亲戚及监护人更是精神不正常，那些允许智者派进入城市并且没有赶他们出城的市民和陌生人一样都是精神不正常……我和我的亲属都不曾与智者派有过任何联系，我也不能容忍他们和智者派有联系”。

对智者派的偏见是由于智者派把知识降低到仅仅为了直接在生计中 useful。希腊人认为，教育仅仅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生计。例如，柏拉图在《论美德》中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学习文法家、音乐家或教练员的技术呢？因为民间有教养的人必须了解他们。”

苏格拉底关于教育内容，即知识学习的观点在理论上基于先验论，但接触到实际问题时，他的观点是通情达理、切实可行的。他以特尔斐神庙墙上刻的警句“认识你自己”作为自己的格言，认为他的职责就是教育自己和同胞认真地作自我解剖。缺乏自知之明、不自量力的人，无论在处理个人私事或国家公事上，都不仅不可能取得成功，而且会遭受祸患。

学习即回忆 从灵魂不朽论出发，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不是后天获得的，人在出生以前就不知从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获得了知识，但在出生时又将它们丢失了。后来，通过把感官运

用于可感觉的对象，又重新获得了已经丢失了的知识。所以，学习不是获得知识，而只是重新唤醒、回忆生前已经具有的知识。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对话集》中谈道：“借助视觉、听觉或任何其他感觉感知了一个对象后，感觉者可以通过联想回想起已经忘记了的对象……他们只不过回忆以前所掌握的知识，换言之，学习就是回忆。”

学习即回忆说割断了感觉对象与知识的联系，割断了感知与思维的联系，知识的源泉在于不可捉摸、不可把握的冥冥之中，使知识蒙上神秘主义的色彩。它同柏拉图由此出发并进一步发展的理念论一样，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思想家头脑中的投影。雅典曾经光芒四射，但后来在现实社会中，充满了冲突、争斗、弊端、阴谋诡计、违法乱纪、道德沦丧。这个衰败中的社会不可能是理想的、长治久安的社会。理想的社会和真理只存在于思想家的头脑中。从现实的感觉对象中不可能获得真实的知识，从现实的感觉中只应激起人们去追求超脱于现实之外的理想、永恒的真理。与其说是回忆生前的知识，不如说是构建未来的理想。苏格拉底的感觉与知识的关系就是柏拉图的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关系，也就是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康德的此岸与彼岸之说就是从这里发源的。千百年来，人们只是简单省事地给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扣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事实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不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反对者，而只是它的改良者，他们不是主张实行雅典以外的某一个城邦（例如斯巴达）所实行的制度，而是追求超越于当时一切现存政治形式之上的理想的国家制度。

如果抛弃其糟粕，学习即回忆说也有积极的因素，如重视感觉，注重新的感觉经验并与已有知识的联系、联想、对比。

这种联想，后来发展成为统觉论。

广博而实用的知识 苏格拉底认为，治国者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他说，“在所有的事上，凡受到尊敬和赞扬的人都是那些知识最广博的人，而那些受到谴责和轻视的人都是那些最无知的人”。为此，他孜孜不倦地教人以各种知识。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说：“凡是一个善良和高尚的人所应该知道的事，只要他自己知道，他总是非常乐意地教导他们，如果他自己不熟悉的话，他就把他们带到那些知道的人那里去。他还教导他们，一个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对于各门实际学问应该熟悉到什么程度。”

苏格拉底重视知识的实用性，主张只学能直接应用的知识。“他说，一个人学习量地学，只须学到在必要时能够对于买进、让出或分配的土地进行正确的测量、或者对于劳动量进行正确的计算……他不赞成为了研究复杂难解的图形而学习量地学；因他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尽管他自己并非不懂这一套。”

他劝人要熟习天文学，“但这只是为了能够知道夜间的时辰、月份节令，为了作水陆旅行、值夜班等工作的方便，以便利用征象来分辨上述时间”这些知识可以从有实践经验的人那里学到。

关于算术，他劝人学习，但也要避免作无意义的劳动。

学习与占卜 苏格拉底认为，人如果要寻求人类智慧所不能提供的帮助时，就只有通过占卜去求助于神明。但是，神明已经使人可以通过学习学会可学的东西，因此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就不必问神。色诺芬说：“至于想要熟练于建筑、金工、农艺或人事管理工作，或想在这一类艺术方面成为一个评鉴

家，或者做一个精于推理、善于持家的人，或者想要做一个有本领的将领，所有这一类事情，他认为完全属于学习问题，是可以由人的智力来掌握的。”连这一类事情也要去问神是愚蠢的。人应当尽自己的主观努力去学习，自求多福。至于人的追求的结果是祸是福，则只有神明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神，放弃主观努力是不对的。如果把苏格拉底所说的神明理解为人所不能控制的异己力量或偶然性，苏格拉底的思想则是积极的。

“精神助产术”

雅典诗人阿加生（约前 488 ~ 前 400 年，希腊悲剧诗人）的家里正在举行宴会。他的一个悲剧在希腊剧场得了头奖，他邀请了最知己的朋友与他共庆胜利。客人们热烈地谈论着他们喜爱的一个话题——爱。每个人都依次表明自己的看法，解释题目的含义。

“爱神，菲德罗（公元前 5 世纪希腊哲学家）说：“是最古老的神，也是最有力量的神之一，正是由于爱，使得平凡的青年成为英雄，因为爱人会为在自己热爱的情侣面前表现出怯懦而羞愧。给我一支由情侣们组成的军队，我就能征服整个世界。”

“是的，接着发言的包散尼是苏格拉底同时代人，他赞同地说，“不过你必须区分开尘世的爱和天国的爱——尘世的爱是两个肉体的互相吸引，天国的爱则是两个灵魂的息息相通。当青春之花凋谢的时候，鄙俗的肉体之爱就会振翅远去，而高尚的灵魂之爱是永恒不渝的。”

接着，古希腊诗人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前 448 ~ 前 380 年）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爱的理论：“在很久以前，两种性别结合在一个身体里，这个身体圆得像一只球，有四只手，四只脚和两个脸。它行动非常迅速，用八只像轮辐似的爪子翻滚。这种男一女合体的力量是可怕的，它们的野心也是无限制的。当它们打算闯入天堂攻打神明时，宙斯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划，‘让我们把它们劈成两半，’他说，‘那么它们的力量就只剩下一半，而我们将得到双倍的祭品。’”

“于是，他把它们劈开，分成了男人和女人。从那以后，曾是一个整体的这两个部分极力渴望着重新合为一体，这种两性重聚的渴望就是我们所说的爱。”

紧接这个对爱的富于幽默的解释之后，其他人又提出了几个有趣的定义。最后，大家请最尊贵的客人苏格拉底谈谈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听了大家的滔滔雄辩之后，苏格拉底说：‘我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的无知怎么能与这样的智慧相抗衡呢？’”

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谦虚，是典型的苏格拉底式的开场白。接下来，他便以自己的“无知”对他们的“智慧”提出了反驳。他提出了一连串无法解答的问题，一一驳斥了他们的论点（苏格拉底是提问式教育法的创立者），在这个破坏性的过程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的意见。他说：“‘爱’是人类灵魂对神圣的美的追求，爱的人不仅是渴望找到美，而且渴望创造美，使美永世长存，在有限的身体中播下不朽的种子。这就是为什么异性彼此相爱——就是为了复制他们自己，从而延长时间使他们永恒。这也是为什么父母爱他们的孩子。对相爱的父母的灵魂来说，他们不仅仅是创造了孩子，而且创造了在

对美的永恒追求中的探索者、合作者、同伴和继承人。”

那么，我们试图通过爱使其永恒的美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智慧、美德、荣誉、正义、勇敢和忠诚。一句话，美就是真理。“真理是直接引导我们走向神的道路”。

然而，苏格拉底要达到的不是超人智慧的神圣顶点。反之，他只是谦虚地致力于人类自身的工作，或如他自己所说的，就是提出问题。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同时他向所有的人证明他们也和他一样无知。学习和促使别人学习就是他的职责。他说：“我母亲是一个助产士，我也努力追随她的足迹。我是一个精神的助产士，帮助别人生产出他们自己的思想。”

所以，这位面目丑陋但谈吐亲切的哲学家，这位扁鼻子、厚嘴唇、鼓眼睛、身体笨拙而思想超凡的苏格拉底，经常出现在雅典的街头，无论在哪里，他都提出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例如：某件事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虔诚？什么是公正？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诚实？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职责是什么？你以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去完成它？你是政治家吗？如果是，那么关于政府你都懂得什么？你是法学家吗？如果是，你怎样从人类的行为来研究他们的动机？你是教师吗？你在敢于非难别人的无知之前，用什么步骤来克服自己的无知？诸如这些，请回答好吗？

他以这样的问题盘问那些“博学”的先生们，暴露他们的无知。但他这样做毫无恶意，正像他希望暴露自己的无知一样。他的目的是通过排除错误而获得真理。“我像猎狗追逐猎物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他疏忽了自己的兴趣，疏忽了自己的职业——他是一个雕塑家——甚至忽